

編後語

冷戰結束十餘年來，全球化大行其道。令人憂慮的是，各國知識生產大多脫離本國的生活世界，失去公共話題的社會也正在喪失批判精神。本期首欄「國家與公共知識份子」的專題討論和多篇文章，正是針對這一現象有感而發。

金泰昌尖銳批評當代日本知識精英「陶醉在只有少數人能夠理解的語言符號和與日常生活無緣的知識會話中」，喪失了識別是非善惡的能力。他認為，現代知識如要改變與德性分離的狀態，就應該實現向以生態倫理和生態美學為核心的「公共知」的轉化。余世存認為，當前中國的知識生產仍停留在前現代階段，只有彰顯個體生命價值、通過政治變革才能扭轉這種現狀。回顧冷戰期間，在美蘇這兩個殊死搏鬥的國家中，知識份子與國家政治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侯艾君考察了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由來、派別以及他們對國家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影響；牛可則研究形成於二戰時期的「國家安全體制」是如何重塑美國的教育和社會科學建制，分析冷戰知識份子的形成、作為和精神特徵。此外，與「國家與公共知識份子」主題相關的文章，本期其他欄目還有數篇，如伊斯雷爾評述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的「公共知識份子」群體，以及他們在國共兩黨專政統治下的命運；黃發有一文指出二十世紀中國的自由撰稿人，時至今日仍缺乏自由意志，走不出「不是墮落，就是回來」怪圈；陸興華嚴厲針砭當前中國的學術腐敗，倡言實現學術共同體、刊物、系科的分權制衡；山脇直司評介「公共哲學」系列書籍和日本公共哲學運動的處境，等等。參照閱讀之餘，不妨思考一下牛可一文提出的如下問題：在高度專業化的學術和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現代民族國家政治之間，在知識價值和社會關懷之間，「知識人將何以自處？」

探討儒家政治文化是本期另一重點。韓東育分析指出，江戶時代的徂徠學派針對孔子地位而提出「非聖脫儒」，是出於日本追求現代化、摒棄超越中國文化的用意。無論是謝茂松解讀王船山的經、史著作，還是蕭國峰評介陳賢研究船山哲學的新著，都突出了船山省察中國政治史的思想成果對近代中國思想發展是有重要意義的。而陳來在為余英時新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寫的長篇書評中指出，該書不僅有力挑戰宋代儒學「轉向內在」的舊說，也生動地呈現出朱熹和當時士大夫群體生活世界的政治生態和政治文化。除眾多佳作外，我們還特別推介陳方正一文。作者精讀四部愛因斯坦傳記，引領讀者在被譽為二十世紀第一人的愛因斯坦的科學業績和豐富精神世界之間穿行，最後提出如何在應然和實然之間「尋找愛因斯坦其人」，的確發人深思。

最後，需要向各位報告，今年中國教育部對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項目結項論文的要求，均明確必須在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方被認可；而本刊已正式列入CSSCI，本刊將一如既往地為各地學者提供發表研究成果和文化討論的園地。